

關於琉球《選日通書》及新發現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的價值

陳捷*

摘 要

琉球《選日通書》是琉球王國根據清朝《時憲書》並結合琉球獨特的風俗、習慣而編制的官製曆書。近代以後，琉球王國文獻資料遭到毀滅性破壞，現存的琉球《選日通書》已寥寥無幾。2013 年 7 月，筆者在調查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舊朝鮮總督府藏書時發現了 8 種以前學界未知的琉球《選日通書》，無論從琉球王國漢文文獻的基本調查的角度還是從琉球曆書研究的角度來看，都具有重要意義。本稿在對現存琉球《選日通書》調查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記載，考察琉球王國編撰曆書的歷史、琉球《選日通書》與清代《時憲書》的關係，並對琉球《選日通書》的內容以及中央圖書館藏《選日通書》的特徵及其價值進行分析。

關鍵字：琉球漢文文獻、琉球本、《選日通書》、東亞文獻研究、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

*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一、前言

琉球《選日通書》是琉球王國根據清朝《時憲書》並結合琉球獨特的風俗、習慣而編制的官製曆書，當時在琉球王府和士人之家是日常經常翻閱查看的日用曆書，也是後世了解琉球王國曆制以及民間習俗和信仰的重要資料。從日常生活必需品這一功能來看，《選日通書》在當時應該有一定的數量。近代以後，隨著琉球王國亡國以及自然災害和二戰戰火的影響，琉球王國的文獻資料遭到毀滅性破壞。首先，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強制推行「琉球處分」，先在 1872 年（日本明治五年）將琉球王國強行降為琉球藩，又於 1879 年（日本明治十二年）強迫琉球國王尚泰王遷居東京，並以武力廢除琉球藩，設置沖繩縣。在這一系列事件造成的社會動蕩中，本來為數不多的琉球文獻發生散逸、損毀。太平洋战争末期的 1945 年，日美軍隊在沖繩展開激烈的戰鬥，在地面戰火和毀滅性的空襲中，明治時期以來經過長期社會動蕩勉強保存下來的文獻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另一方面，尚泰王被挾持到東京時帶走的大批文獻資料也分別在 1923 年（日本大正 12 年）9 月關東大地震和 1945 年東京大空襲時遭遇火災。在歷經這一次次災難之後，琉球王國文獻資料多有散失。在這一背景下，本來是琉球王府和士族之家座中必備的《選日通書》，在先行研究、調查報告及以往目錄著錄中能夠見到的只有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久米島上江洲家（UEZUKE，琉球王朝時代士族之家）文書中的咸豐、同治年間的 8 種《選日通書》等寥寥數種。¹筆者 2013 年 7 月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央圖書館）調查該館所藏舊朝鮮總督府藏書時有機會調閱了朝鮮總督府舊藏書中的《琉球曆》（古 7-20-118）。這批統一標為「琉球曆」的線裝小薄冊子被裝在一個大牛皮紙信封中，其中刻本 1 種，鈔本 7 種，每種 1 冊，共計 8 冊，其內容正是琉球編撰的《選日通書》，8 種均為學界以往所未知，無論從琉球王國漢文文獻的基本調查的角度還是從琉球曆書研究的角度來看，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對現存琉球《選日通書》調查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記載，考察琉球王國編撰曆書的歷史、琉球《選日通書》與清代《時憲書》的關係，並對琉球《選日通書》的內容以及中央圖書館藏《選日通書》的特徵及其價值進行分析。

二、清朝《時憲書》與琉球《選日通書》

¹ 久米島上江洲家文書中的《選日通書》共有咸豐四年（1854）、咸豐五年、同治四年（1865）、同治六年、同治八～十一年共八種八冊。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已經收入高津孝教授與筆者共同主編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 2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在中國明末時期，耶穌會傳教士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ロンゴバルディ）、羅雅谷（Giacomo Rho，ジャコプスニロー）、鄧玉函（Johann Schreck，テレン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アダム・シャル）等人接受崇禎皇帝詔令，修訂從洪武元年（1368）開始使用的《大統曆》。在徐光啟等人的協助下，他們根據長年的實測以及西洋天文學成果編成了《崇禎曆書》，但這一曆書尚未及頒布，明王朝就已經滅亡。清朝統治確立之後，將湯若望等人獻上的新曆書重新編為《西洋曆法新書》，並在此基礎上於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編制了新的曆書《時憲曆》頒發全國。清乾隆元年（1736年），為避乾隆帝名諱「弘歷」，將《時憲曆》改名《時憲書》，直到清末，每年由朝廷頒發全國。

琉球從1372年（明·洪武五年）至1879年滅亡的400年間一直接受中國明清兩代的冊封，雖然在遭受日本薩摩藩侵佔以及明清交替之際等特殊時期也曾採用日本曆法，但更長的時期內基本上是奉明、清王朝正朔，使用的是中國的曆法。在清代，琉球使節每年從中國政府領取100部《時憲書》帶回琉球在國內頒布使用。不過，由於氣候等原因會影響到航行時間，返回琉球的船隻往往發生大幅延遲的情況，這時就必須在琉球本土編製曆書以應日常需要。在這一背景下，琉球國王通過向中國派遣學習曆法的留學生等方法積極培養熟悉曆法的人材，並設置司曆通事官從事推算、修正和刊行曆書的工作。

關於琉球造曆的情況，琉球王國編纂的正史《球陽》卷七有如下記載：

成化乙酉，金鏗奉使為通事，入閩，以慶賀進貢並求錢。時學曆法而來，始造曆，以行乎國中。然歷年已久，未免舛誤。康熙乙巳，楊春枝奉憲令從司曆官金守約已學曆法，至丁未年，奉命赴閩再學曆法，四載而歸。題請刻板曆書，未及成功，不幸而死。其弟楊春榮從兄學曆法未成，亦從金守約而學曆法，盡得其法焉。後亦奉命為司曆官。是年，刻板已成，遂為印造，通行於國中。²

由此可知，明成化元年（1465），琉球使節金鏗前往中國進貢時學得曆法，並造曆行於國中。以後因久經歲月，多有舛誤。清康熙六年（1667，日本寬文7年），琉球官府派遣曾經從琉球司曆官金守約學習曆法的楊春枝前往福建省學習曆法。楊春枝於四年之後學成歸國，並準備刊刻曆書，可惜尚未完成即已辭世。其弟楊春榮也向金守約學習曆法並成為司曆官，終於在康熙十三年（1674）刻成曆書，在琉球國內頒行。

此外，《球陽》同卷中還可以看到以下記錄：

² 《球陽》卷七。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八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所收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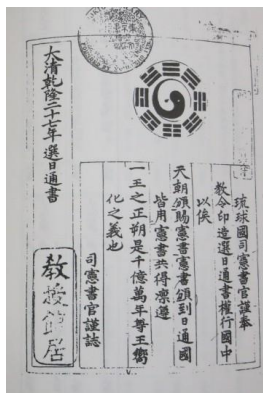
康熙戊午，蔡肇功【湖城親方】奉命為學曆法，隨正使耳目官向嗣孝【前川親方朝年】到福州。追隨薛一白，盡學曆法。至於壬戌年回國。蔡肇功為司曆官，重修刻板，遂為印造大清時憲曆，頒行國中。³

也就是說，在以楊春榮為中心編制的曆書出版僅僅五年之後的康熙十七年（1678），久米村的蔡肇功再次接受王命被派遣到福州學習中國曆法。四年之後的1682年，蔡肇功回到琉球，擔任了司曆官，並重修刻板，印造了大清時憲曆。

關於蔡肇功印曆之事，《球陽》使用了「大清時憲曆」這一表述。從這一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琉球司曆官印刷的曆書與清朝頒布的曆書同樣也稱為「時憲曆」。但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尚敬王接受了紫金大夫程順則的建言，將琉球官製曆書名稱由「時憲曆」改為「選日通書」。關於程順則的提案，《球陽》卷十是這樣記載的：

自古琉球曆書皮用黃紙，名曰《時憲曆》。紫金大夫程順則題請改曰《選日通書》，並外皮以紅紙，且改撰皮面文書，以行國中。⁴

根據這一記錄可知，程順則建議的內容不僅是更改書名，還包括將封皮由黃色改為紅色、改寫封皮文字。由中央政府編制並頒發《時憲曆》是清王朝權力與統治的象徵，將琉球編制曆書的名稱由《時憲曆》改為普通的民間通書常用的《選日通書》，其中顯然具有對清王朝的宗主國地位表示尊崇寓意。此外，黃色也具有王權象徵的意義，清代記錄皇帝行動的《實錄》、《玉牒》以及皇帝「欽定」的書籍等常常使用黃色封皮。將書皮由黃色改為紅色，這一建議應當也是出於要顯示對清王朝尊崇之意的考慮。建言中的「改撰皮面文書」是指改寫曆書書皮上的文字，但是《球陽》中並沒有記錄其具體內容。不過我們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據琉球刻本《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所鈔鈔本的書衣上可以看到以下文字（圖1）：



圖版1 據琉球刻本
《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
所鈔鈔本書衣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琉球國司憲書官謹奉/（高一格）教令，印造《選日通書》，權行國中，/以俟/（高二格）天朝頒賜憲書，憲書頒到日，通國/皆用憲書。共得凜遵/（高兩格）一王之正朔，/是千億萬年尊玉嚮/化之義也。/（空四格）司憲書官（標下線者為與《中山傳信錄》引文不同處）

³ 同註2。

⁴ 《球陽》卷十，同註2，第九冊。

這段文字除個別文字之外，基本上與後文所述在程順則建言的兩年之後來到琉球的清朝冊封使徐葆光所撰《中山傳信錄》中的引文相同，說明這正是琉球國王接受程順則建議「改撰」之後的「皮面文書」。更改之後的文字明確表示琉球司憲書官們編撰、印刷的《選日通書》只不過是中國曆書尚未運來之前的代用品，一旦清朝頒發的《時憲書》運到之後，琉球國內使用的曆書將全部改用《時憲書》，通過遵奉清朝正朔以表示對清王朝的尊崇和臣服。顯然，與書名改稱和變更書皮顏色一樣，修改「皮面文書」也是明確表示琉球臣服於清王朝的一種姿態。

關於程順則向琉球國王建言的理由，在現存文獻中並無明確記錄。但是從當時時代背景分析，這恐怕是為了迎接翌年將要到來的冊封使而進行的準備工作的一環。在程順則向琉球國王建言的前一年即 1717 年（清康熙五十六年），琉球進貢使耳目官夏執中、正議大夫兼國師蔡溫前往北京，請求清朝冊封琉球國王尚敬，並得到了清朝允諾。1718 年（清康熙五十七年），為了迎接清朝冊封使到來，琉球國內正在進行各種細緻的準備。例如，琉球國王宗廟的圓覺寺住職覺翁長老專門在寺內栽培花木以備冊封使光臨時鑒賞，為此得到了國王的褒獎。⁵擅長舞蹈表演的首里人向受祐（琉球名為玉城朝薰）也在這一年被任命為「踊奉行」，負責準備款待招待冊封使的表演。他將流傳於琉球的故事編為舞蹈，創作了琉球最古的「組踊」（組舞），並於翌年在招待冊封使的宴會上表演。⁶程順則提出更改琉球曆書名稱、書皮顏色以及書皮上的說明文字等建議，看上去似乎都是與曆書內容無關的瑣細小事，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他在此時對國王提出這一建議的必要性，就會發現這些都是為了向將要來訪的冊封使展示琉球國王對清朝的尊崇之心的措施。在朝貢冊封體系之中，使用清朝頒發的《時憲曆》（乾隆以後的《時憲書》），即奉清朝之正朔，這不僅僅是推算、編制曆法的知識問題或挑選曆書的實用性問題，而是是否誠心遵從宗主國與從屬國關係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大事。程順則正是充分認識到此事在外交上的重要性所以向尚敬王建言，尚敬王也是因為充分理解此事的政治意義所以採用程順則的建議。

1719 年（清·康熙五十八），由翰林院檢討海寶擔任冊封正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擔任副使的冊封使團來到琉球。他們在琉球停留期間果然看到了琉球印造的琉球曆——《選日通書》。冊封副使徐葆光撰寫的琉球見聞錄《中山傳信錄》卷五「曆」條有下述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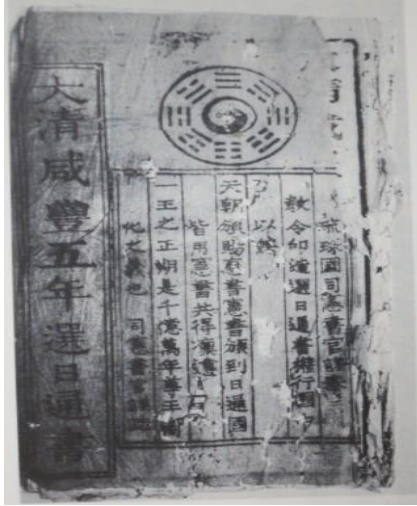
曆奉正朔。貢使至京，必候十月朔頒曆費回。及至國，已踰半年。故國人設司曆通事，官秩七品，豫推算，造曆應用。曆面書云：「琉球國司曆官謹奉教令，

⁵ 「圓覺寺乃宗廟，而非諸寺之可比。其住持覺翁長老以冊封天使將臨本國，故栽花木，以致美觀，因此褒書。」《球陽》卷十，尚敬王五年。同註 4。

⁶ 「首里向受祐（玉城親雲上朝薰），博通技藝。命為戲師，始以本國故事作戲教人。此年演戲供興於冊封天使宴席，其戲自此而始。」《球陽》卷十，尚敬王五年，同註 4。

即造《選日通書》，權行國中，以候天朝頒賜官曆，共得凜遵一王正朔，是千萬億年尊王歸化之義也。」⁷（標下線處為《中山傳信錄》引文與前出《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不同之處）

這段文字首先強調琉球使用中國正朔，朝貢使每年到京都時一定要等到十月朔頒發曆書之後帶回，但是回到琉球時往往已經晚了半年，所以只能設置專門官職推算編制代用的曆書，其後抄錄曆書書皮上的說明文字。觀其內容，與前述《球陽》所敘述的琉球造曆情況



圖版2 琉球版《大清咸豐五年選日通書》
書衣（上江洲家文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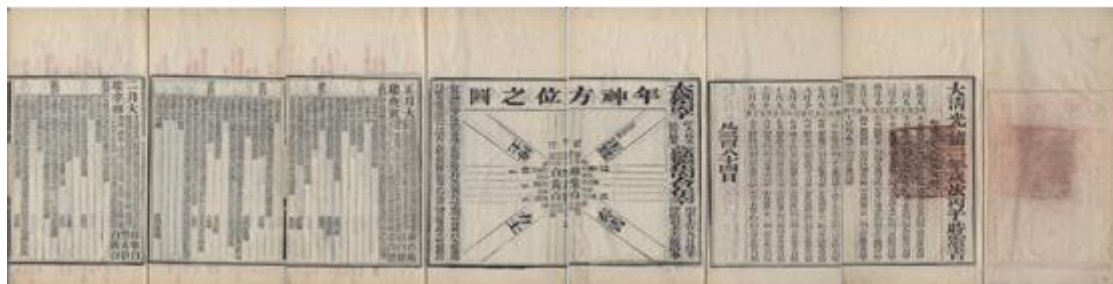
基本一致，應當是根據琉球方面的介紹所做的記錄。特別是從書中除個別異文之外幾乎照錄《選日通書》書皮文字全文的情況看，很可能徐葆光是親眼見到過琉球《選日通書》實物的。

琉球曆書改名《選日通書》之事並應付檢查的一時之計，實際上，這一書名一直到琉球王國滅亡之後仍在使用的。此外，上文引用的根據琉球刻本抄錄的《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鈔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上江洲家文書本《大清咸豐五年選日通書》等書衣上也都有相同的文字，可見這段文字也被後世繼承下來（圖2）。

三、琉球《選日通書》的內容和中央圖書館藏《選日通書》的特徵

清朝《時憲書》的內容包括朔望、上下弦、日出入晝夜時刻、二十四節氣時刻、日月食等與曆學相關的部分和關於一年內每天的禍福、禁忌等方面的註記（即曆註）部分。琉球《選日通書》除了不收錄清朝《時憲書》中關於全國各地差異的記述之外，在形式和內容上基本承襲《時憲書》的內容。下面就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時憲書》與韓國中央圖書館所藏同年《選日通書》略作比較。

⁷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五〈曆〉。



圖版 3 《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時憲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版 4 《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選日通書》（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時憲書》為黃綾書衣（29.7×17.0cm），書衣左側有與其相同質地的四周雙邊印刷題簽，邊框中印有「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時憲書」書名。前書衣內封（封面）為朱色刷印，下部因顏色褪色看不清楚，但可以看到上方刻有分別寫在雙重圓圈中的「萬」、「年」、「書」、「鑑」4字。卷端首行及第二行跨行刻書名「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時憲書」，次行降四格題「都城順天府節氣時刻」（1葉），四周雙邊（18.5×13.2cm），半葉9行，第一葉末占二行題「凡三百八十四日」。次葉為「年神方位之圖」（1葉），其次為曆表。曆表欄上朱印「喜神東南方」、「月空四相」、「天德合歲德合（月德合/四相）」等，欄下朱印「反支」、「月刑」、「月厭長尾」、「天吏」、「四絕往亡」等。曆表之後有「紀年」2葉，編纂責任者姓名（1葉）。從其裝幀形式和內容來看，可知是清朝內府刻本。與其相對照，中央圖書館藏《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選日通書》卷端的「都城順天府時刻」、「年神方位之圖」部分與《時憲書》的形式相同，曆表中月日、干支、納音、⁸二十八宿、十二直等曆學以及曆註的各個項目、宜忌（吉兇）和「宜冠帶（宜用辰時/坐向東北）結婚姻 會親友 裁衣豎柱上梁（宜用辰時） 經絡立券交易」等擇日項目也基本相同。不過，琉球《選日通書》中有清朝《時憲書》中沒有的「祈禱」項目，這是琉球《選日通書》特有的項目，可以看做是琉球曆的

⁸ 納音為古代風水學術語，指術數子測時使用的取「數」方法，一般是利用陰陽五行說和五音，將六十干支分為木、火、土、金、水五行，再分別加上形容詞，將其分為「海中金」（甲子·乙丑）、「爐中火」（丙寅·丁卯）等30種。

一個特徵。此外，將兩本對校，還可以發現不少文字異同之處。例如，「年神方位之圖」首行「太歲在丙子（小字：幹火枝水/納音屬水）歲德在丙合在辛（小字：丙辛上宜//修造取土/九日得辛//十二龍治水）」雙行小字註中「丙辛上宜」四字，中央圖書館本誤作「辛丙上宜」。「年神方位之圖」右面國家圖書館本「丑」字之下有「金神」二字，中央圖書館本闕。該圖中西南方向「力士」下國家圖書館本無註，但中央圖書館本則註有四個小字「破敗五鬼」。

在中央圖書館所藏 8 種琉球《選日通書》之中，只有光緒二年一種是刻本。該本書衣為後補，所以無法確認原來是否也有像日本國會圖書館本或上江洲家文書本那樣的書衣。對比圖 3 和圖 4 可以看出，中央圖書館本的雕刻和刷印質量都遠遠不如國家圖書館本。事實上，在目前存世數量不多的由琉球人出版的出版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或日本刊刻的，可以確認刊刻、印刷於琉球國內的書籍數量很少。⁹ 本書的刊刻和刷印水平在現存為數不多的琉球刻本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由於對書籍數量需求較小，琉球國內沒有形成專門的印刷出版行業，這是琉球國內刊印的書籍刻印質量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此本也是重要的物證之一。

此外，關於光緒二年《選日通書》刻本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該本的紙張問題。此本從第一張到最後一張，全冊用紙均如圖 5 中箭頭所示，從後半葉大約占三分之一處用漿糊粘連起來。因為有不少粘連的接縫處上面印有文字，可以推斷出這些紙張是在印刷之前用同樣大小的紙張粘連好之後用於印刷的。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以用當時琉球印刷用紙的稀缺來解釋，而此本恰好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實例。



圖版 5《大清光緒二年選日通書》（箭頭所示為紙張接縫處）（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與上述刻本同時收藏於中央圖書館舊朝鮮總督府藏書中的還有清光緒十五年（1889，明治二十二）～十七年、光緒十九～二十一年和光緒二十六年共 7 種《選日通書》鈔本，應該來自同一琉球所有者。同一所有者持有的這些《選日通書》中只有一種刻本，其餘均為鈔本，這或許可以說明當時刻本比較稀少，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較多使用的是根據刻本轉寫的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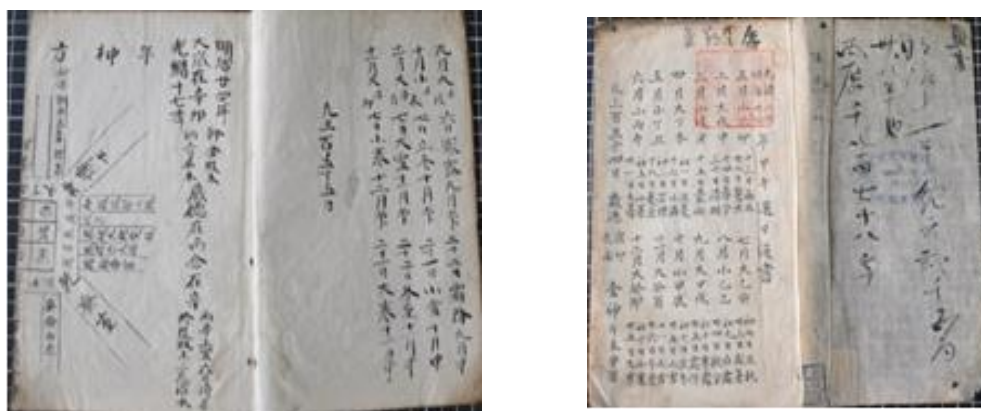
還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在光緒二年《選日通書》刊刻數年之前的 1871 年（日本明治四、清同治十年），日本政府實行廢藩置縣，最初將琉球歸入鹿兒島縣管轄，1872 年又改設琉球藩，命琉球國王尚泰為琉球藩王，此後再三要求琉球斷絕與清的朝貢冊封關係、使用日本明治年號和琉球藩王前往東京。1879

⁹ 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日〕高津孝：《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那霸：榕樹書林，2010）。

年（日本明治十二、清光緒五年）又逼迫尚泰移住東京，並動用武力廢除琉球藩，強行設置沖繩縣。但是，從中央圖書館所藏光緒二年《選日通書》刻本以及之後的 7 種鈔本《選日通書》可知，在 1879 年的所謂「第二次琉球處分」之後，琉球人仍在繼續使用《選日通書》。而且即使是在琉球被迫斷絕與清朝的朝貢冊封關係、外交往來和被強迫使用明治年號之後，光緒二十一年《選日通書》卷端的「二十四節氣時刻」的最初仍然題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圖版 6）。此外，光緒十七年、光緒二十年《選日通書》並列使用光緒、明治兩種年號（圖版 7），另外的 4 種則內文均不用年號，只用干支或太歲紀年，其中一種書衣並列光緒、明治年號和西曆、皇紀紀年四種紀年法，另外三種則只記光緒年號（圖版 8）。從這些現象看，正如當時不少琉球士族在究竟選擇親清還是親日的立場的問題上各有選擇或猶豫不決一樣，在日常生活中究竟使用哪一種年號的問題上，也存在相當大的搖擺和困惑。特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之後，琉球王國的復國運動幾乎走上絕境，但是琉球士族在使用《選日通書》時仍然習慣性地使用清朝年號，這應當說是一種意味深長的現象。



圖版 6 光緒二十一年《選日通書》書衣、「二十四節氣時刻」



圖版 7 光緒十七年、光緒二十年《選日通書》



圖版 8 光緒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六年《選日通書》書衣

四、結語

以上，我們考察琉球造曆歷史、琉球《選日通書》與清朝《時憲書》的關係，同時，對新發現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琉球《選日通書》的內容、特徵及其價值進行了考察。這些曆書原來的所有者後來經歷了怎樣的命運？這些書籍是如何躲過琉球亡國引起的激烈社會動蕩、極為殘酷的戰爭、毀滅性的空襲以及種種自然災害，又是經過怎樣的渠道在流入日本書店之後輾轉進入舊朝鮮總督府圖書館，靜靜地沉睡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書庫之中的呢？在筆者和日本鹿兒島大學高津孝教授合作主編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即將出版之前，當筆者從那個普通的牛皮紙信封中取出這些《選日通書》的時候，內心感到感慨萬端。幾年過後，以在編輯《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之際曾經給予我們極大幫助的沖繩縣うるま市立圖書館的榮野川敦館長為代表的うるま市教育委員會調查團隊在日本山形縣等各地又陸續發現了多種新出的琉球漢文文獻，其中包括現藏於山形大學小白川圖書館的林泉文庫中的一批琉球文獻。林泉文庫是米澤人伊佐早謙的舊藏書，其中也有一部清欽天監刊刻的朱墨套印本《大清道光二十七年時憲書》¹⁰，目前尚不能確定是不是經由琉球傳入的。關於琉球造曆以及琉球人利用曆書的具體方法等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尚有待於新資料的出現和更多研究者的關注，希望拙稿能對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¹⁰ 《うるま 漢詩ロード散策》No.3，日本沖繩縣うるま市立中央圖書館市史編纂室，2014年2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長洲徐氏二友齋刊本，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

《球陽》影印本，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二、近人論著

〔日〕高津孝：《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那霸：榕樹書林，2010年。

〔日〕日本沖繩縣うるま市立中央圖書館市史編纂室：《うるま 漢詩ロード散策》No.3，2014年。

On Newly Identified Copies of Ryukyu Calendar

Xuanri Tongshu

Chen Jie*

Abstract

Xuanri Tongshu is an official calendar published by the Ryukyu Kingdom. It is based on Qing China's Shixian shu (state calendar of the time), while also taking into the elements of Ryukyu's ow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Because many texts of the Ryukyu Kingdom have been lost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era, not many copies of Xuanri Tongshu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recently found eight copies of this book, which haven't been identified befor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former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preserved toda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These newly found materials are of great value both to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exts in Ryukyu as well as to the research on Ryukyu calendrical books. Drawing from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current extant copies of Xuanri Tongshu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first provided an overall history of calendrical books compilation in Ryukyu, then analyzed content of Xuanri Tongshu, together with its the relationship to Qing China's Shixian shu. Through these analysis, this paper shed ligh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ce of Xuanri Tongshu preserved in the collection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Keywords : Chinese Texts in Ryukyu 、 Ryukyu Texts 、 *Xuanri Tongshu* 、 Book history in East Asia 、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